

（二〇一八年九月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追根溯源】	文革指导理论批判	王复兴
【史海钩沉】	“二丁事件”和庄则栋政治浮沉	钱江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追根溯源】

文革指导理论批判

· 王复兴 ·

史无前例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的，他既是总指挥官，又是总设计师、总策划师、总导师、总执行官。文革自始至终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他的文革理论包括：哲学理论、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无产阶级全面专政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五七”理想社会蓝图、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理论、反修防修目的论等。实践证明：文革的指导理论荒谬绝伦，它使中华民族遭到巨大灾难和空前浩劫。在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实践中，其恶果也得到了充分验证。为防止其谬论在中国大地死灰复燃，谬种流传，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批判，以肃清其影响。

一、关于斗争哲学

文革的指导理论是以毛泽东“一分为二”的理论为其哲学基础。毛泽东认为：任何事物内部都是对立的统一。矛盾无处不在。矛盾的双方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联结，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毛泽东的“一分为二”强调：矛盾双方相互斗争，通过斗争，一方吃掉另一方，从而使矛盾转化，达到新的对立统一。毛泽东夸大斗争在对立统一中的作用，把斗争说成是绝对规律，而忽视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相互依存。并因此把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斥为修正主义。毛泽东进一步延伸，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这与毛泽东年轻时期的人生观一脉相承，毛泽东于1917年在《奋斗自勉》一文中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在文革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毛泽东的御林军迟群、谢静宜曾把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概括为：斗，斗，斗，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在这种哲学的指导下，文革斗得天下大乱，斗得人性沦丧，斗得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斗得社会停滞、倒退。

文革后，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对此党的基本理论有深刻反思。《纽约时报中文网》于2018年5月30日，刊登了李锐女儿李南央发表的她对鲍彤的三次访谈录。该文中，鲍彤曾谈及赵紫阳文革后的大彻大悟。

鲍彤说，我听赵紫阳讲过两次，一次是跟我说的，一次是跟几个外国经济学家说的。一句什么话呢？他说：“文化大革命使人大彻大悟。”这话很多人都说过，但是深度不一样。……胡耀邦也总结，也反思，最有代表意义的是他的“平反冤假错案”，而且从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冤假错案，一直延伸到“AB团”，1949年以后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都要平反。这是胡耀邦的一个反思。彻底不彻底？彻底！一直彻底到党的历史，党是一个冤假错案的制造者，像条流水线，一直在不断地制造。

赵紫阳的反思跟胡耀邦的反思有共同点，但是也有很不一样的地方，紫阳是彻底的。文革初期赵紫阳在广东，群众把他斗得一塌糊涂，他就想：为什么造反派要这样斗我？他跟人说：“因为过去我们把人家斗得一塌糊涂，所以人家今天要这样斗我们。”这就涉及到了问题的根本。胡耀邦是说：我们党在历史上犯了很多错误；赵紫阳说：我们党的基本理论有问题！……我们党的斗争哲学是错误的！他从根儿上看到党的路线、党的工作方法，一贯是左的、错误的。这是他大彻大悟的基础。所以很多文革“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很多老干部，认为造反派是“冤假错案”的制造者，他们受到的是造反派的迫害，这样一来，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是造反派的罪恶。不对！斗老干部的造反派也是受害者。“五一六”，到现在那些所谓的“五一六”分子还不是压在石头底下？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都是受害者，全中国老百姓都是受害者，人都变得没有人性了，都变成兽性了，这还不是受害者？！弄到最后，他（毛泽东）的老婆也是受害者，变成反革命。弄到最后，他自己也是受害者。什么受害者啊？变成反革命家属。全中国人，当时十亿人，包括毛泽东，都是受害者，都是党的理论的受害者。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是根据党的理论造反的。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从党的基本理论上解决起。这是紫阳文革后的大彻大悟，他找到了根源！

笔者对以上赵紫阳先生对斗争哲学的反思与评论，深为折服。

文革前夕，“合二而一”论与“一分为二”论在报刊上曾有公开论战，杨献珍的“合二而一”遭到批判。这是当时思想理论界的一个重大事件。杨献珍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他被认为是“大跃进”灾难之后比较有反省的一位党内高干、理论家。他的“合二而一”与毛泽东的“一分为二”对“对立统一”规律的论述有所区别。杨对其社会含意强调发展的稳定与平衡，反对人为地制造和激化矛盾，这很显然与毛泽东所强调的“一分为二”的斗争规律以及阶级斗争理论有根本差别。对杨献珍的批判与当时毛泽东对宇宙论的讨论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毛企图说明他发动文革是依据宇宙的普遍规律，依宇宙的终极真理，因此天然合理。类似中国古人所说的“承天命”。

毛泽东在文革前夕，大谈哲学，大谈一分为二，大谈基本粒是子无限可分，大谈事物发展不平衡的普遍性，大谈宇宙学，多次在会议中谈论宇宙真理。毛泽东在马列主义理论中找不到发动文革的充足理论根据，因此他要表明，他发动文革是依据宇宙的终极真理行事，他便是真理的化身。

二、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

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是毛泽东文革理论中的基础理论。

毛泽东一生信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信奉其名言：“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坚信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主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1949年以前，毛泽东与中共领导以阶级斗争为纲，从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大国的实际出发，提出农民是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伟大同盟军”。以土地革命发动农民跟着共

产党起义，用暴力推翻国民党统治。在1947至1949年在所有解放区先后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中共以“斗争土改”的方式，把地主“扫地出门”，剥夺、瓜分了地、富的田产、浮财、房屋、牛马、农具予贫农、下中农、雇农，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中共以阶级利益为引导，争取到广大贫苦农民的衷心支持。当时农村的雇农、贫农、下中农占农村人口的90%，总数将近三亿。如此雄厚的人力要保住自己的阶级利益，必须跟着共产党把革命进行到底，从而形成了亿万农民后备大军，使中共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夺取了天下。按陈毅元帅的形象说法，“解放战争”是由亿万农民推着小轮车支援前线，支援解放军，用小轮车推出来的胜利。简言之：中共是靠土改夺得了天下。毛泽东靠阶级斗争取得了民主革命的成功，革命胜利证明了阶级斗争理论的正确，他从而更加迷信于阶级斗争。

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国以后，中共本应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应从领导战争转变为领导建设，应从斗争、破坏转变为和谐、发展。但毛泽东迷信于革命战争的胜利经验，迷信于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前进的灵丹妙药，迷信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继续在阶级斗争的惯性轨道上奔跑，不肯转弯。

毛泽东不肯转弯，不肯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最明显的事例就是对1956年中共“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提法的否定。“八大”“政治决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规定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据王光美回忆，“八大”闭幕后第三天，在“十一”国庆日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是错误的，主要矛盾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全党决议便如此由最高领袖轻易推翻。到了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于文化革命中贯彻始终。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是：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引自：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告》）

1949年以后，毛泽东与中共领导以阶级分析法，把中国社会划分为不同阶级，分而治之，以维护一党专政的统治。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反动阶级”是一个庞大的“贱民阶级”，是由“身份”所决定的具有“原罪”的阶级，这就是：地、富、反、坏黑四类。1949年时其总人数有2000万人，肃反运动时杀了70万人。（数据引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2004年披露）地、富在土改时已被剥夺了土地，要靠双手劳动吃饭，但身份却永远不变。反、坏是指前国民党军政人员，据文革中的“公安六条”是具体指军队连长以上，基层政权保长以上，警队警长以上，以及会道门小道首。坏人还包括投机倒把分子等。黑四类没有公民权，没有人身安全保障，他们可以被非法监禁，非法杀戮。在文革中成了“群众专政”的对象。

1957年反右运动，定了50万右派分子，最新解密的数字是全国划了300万右派分子。于是黑四类变为黑五类：地、富、反、坏、右。

黑五类不久变为黑六类。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于是黑五类加上资本家（不算小业主）成了黑六类。资本家有20万人。黑六类是：地、富、反、坏、右、资。

十七年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黑六类所遭受的苦难，远远超过后来的“走资派”。但文革后，随着“官僚集团”中的大部分人官复原职，他们纷纷控诉自己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却鲜有为黑六类鸣不平的呼声。因为黑六类遭受的苦难，甚至杀害，似乎是天经地义，理所应该，合理合法。但他们也是人啊！特别是地、富的土地、财产早就在1949年前后已被剥夺干净，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在1949年以前，他们大多是靠劳动致富，辛辛苦苦购置田产，代表了农村中的生产力，并成为维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乡绅阶层。1949年土改以后，他们被贴上“反动阶级”的身份标签，被打入十八层地狱。2000万四类分子，加上他们的子女、亲属，那就是上亿人啊！发动文革的一个基本理由，就是因为黑四类、黑六类存在，宣传反动阶级无时无刻不企图变天、复辟，因此必须开展阶级斗争，对敌人实行专政。

这种阶级斗争在文革前甚至发展、蔓延至中学。北京男四中这所北京著名的重点中学，于1964年11月至1965年8月经历了一场“四清运动”，又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四中的“社教”是由北京市教委派出的工作组领导，组长是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李晨。当时由工作组布置，在学生中重点批判反动学生毕向明。毕向明是笔者所在高三4班学生，家在北京郊区农村，祖父是富农，学习成绩好，但不大关心政治。社教中高三各班轮流开批斗会，批判毕向明。工作组确定毕为批判重点，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其家庭出身，他祖父在土改时被划为富农。在高三4班的批斗会上，同学们就曾逼迫他交出“变天帐”（指土改前的地契），这是从流传的农村四清中的故事学来的。毕当然交不出来。同学逼迫毕交待“反动思想”，不交待就不能过关。毕在逼、供、信下被逼急了，开始顺竿爬，胡说八道，说什么：“我曾想混进中南海，炸中南海！”“你进不去，怎么炸？老实交待！”“我可以向同学借证件，混进去。”（四中有许多高干子弟，有的家住中南海，有出入证。）于是引来一片“反动透顶！”“坚决镇压！”的声讨。会后有人跑去找工作组，要求枪毙毕向明（被工作组否定）。毕向明被工作组定为敌我矛盾，于1965年毕业时，不允许他参加高考，后被发配到北京团河农场劳改。

文革前夕，阶级斗争的气氛，由四中社教中高三年级一个班里的“斗争”，可窥见到一个缩影。

四中在社教中的这种阶级斗争现象，在文革初期被由高干子弟为主组成的第一代中学红卫兵（俗称“老兵”）发展为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引起中学生的巨大分化与激烈对抗。“对联”遭到广大中学生和市民的普遍反对。

这种针对“黑六类”的中共传统性阶级斗争，不必经过法律程序，具有斗争、专政的合法性，贯穿于文革始终。

1966年8月，首都发生了恐怖的“红八月”。“老兵”血腥镇压、殴打、杀戮“黑六类”。8月的北京城，各中学红卫兵（老兵）以高干子弟为主，蓬勃兴起。这是在中学出现的第一批红卫兵，在海淀有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北航附中、矿院附中、101中、八一学校等；在城区有四中、六中、八中、师大女附中、25中、三中等。在《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等口号的号召下，他们在校内造校长、老师的反，并“杀”向社会。当时天天听到各种传闻：中学红卫兵穿着旧军装，在市区到处搜寻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分子，抄家，遣返地、富回乡，用铜头皮带抽打“坏人”，打死了许多地主、地主婆，等等。笔者弟弟王复强当年在西四兵马司胡同家门口，亲眼看见被打死的邻居老太太，说是“地主婆”，尸体被“老兵”扔上卡车拉走。8月5日，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本校红卫兵打死。六中的审讯室里用人血在墙上写着“红色恐怖万

岁！到1966年8月底止，在北京城区被“老兵”打死的人有1772人。（这是根据文革后《北京日报》公布的北京市公安局档案）。

8月至9月，北京还曾掀起一个“遣返运动”，红卫兵要把北京市的黑六类及其家属赶出北京，遣返乡下。两个月内有8万至10万人被遣返。此“遣返运动”起源于“西纠”的《第四号通令》，《通令》第7条说“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这个《通令》在北京全城甚至全国张贴，造成十分恶劣的后果。当时北京火车站每天有几千个红卫兵（老兵），穿着旧军装，腰扎武装带，手拿铜头皮带或木棍，搜身，打人，驱赶黑六类人群进火车站。有的被遣返的人在火车上被打死；有的回了原籍，没房子没饭吃而饿死；有的不被原籍农村生产队接受又赶回了北京。我的北大校友马西沙，他的父亲马旭是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马西沙多年后告诉我，他的祖父在49年前是密云的大地主，是种地高手，劳动致富。土改时被扫地出门，搬到北京市内住。红八月时，祖父、祖母被遣返回密云农村，而后奶奶被红卫兵打死了，爷爷藏了起来躲过杀身之祸。马西沙告诉我“抗战时期父亲去延安，爷爷给了父亲一口袋银元上路。爷爷支持抗日。”据我了解真实的抗日历史，地主阶级是一支坚决抗日的政治力量，如日本占领了家乡，他们会失去自己的土地，因而坚决抗日。但他们因拥有田产，土改时便被中央认定只有反动的历史。

文革中、后期，“革委会”当权派为着恢复一党专政的统治秩序，对造反派群众进行了广泛的镇压，镇压时又常常是以造反派中混杂有“黑六类”说事。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广西1968至1969年韦国清对四二二派的镇压。当时镇压的借口便是说四二二派中有个“莫须有”的“反共救国军”。当局以贯彻“七·三”、“七·二七”布告、制止武斗为名，大搞武斗，出动民兵和军队，武力镇压四二二。在镇压过程中，杀害了众多“黑六类”及其子女、家属。据文革后广西处遗（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组的官方调查报告，广西当时被杀害的四二二派群众，有87000多人。当时广西的阶级斗争甚至发展到人吃人，对敌人挖心挖肝，吃掉敌人！骇人听闻。

例如：1968年广西革委会成立之前，宣武县发生了保皇派“联指”大规模吃“造反大军”（四二二派）的事件。下面引用中共广西整党办公室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所记载的史实。1968年6月15日武宣县发生了大规模吃人肉的野蛮事件。五星大队“联指”民兵李坤寿、彭振兴、李振华等将“造反大军”刘业龙、陈天掌等4人拉到三里圩游斗。在车缝社门口，刘业龙、陈天掌等四人被凶手打死，李坤寿等拔起尖刀，挖死者的肝，割他们的肉，拿回大队部去会餐品尝。从是日起至8月底止该县造反大军及其观点的干部群众，有75人的心肝和肌肉先后被野蛮者吃掉，吃人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工人、农民，有国家干部、中共党员。广西发生吃人事件共有19个县和柳州市

广西杀人、吃人是反人类的暴行。其根源，一是从十七年至文革不断宣传的“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观念深入了人的血脉；二是阶级路线所制造的以“出身”、“成分”区分贵、贱的“高贵种姓”对“低贱种姓”的歧视与屠杀；三是文革中后期的当权派以地方驻军、各地武装部、民兵组织为依托，对触犯了他们权力、利益的造反派群众，进行血腥报复。阶级斗争激活了人性中的兽性，严重扭曲了人性，出现了返祖现象，中毒深者体内古猿人的嗜血基因竟被激活。文化大革命成了文化大衰退。时至今日，恢复人的善良天性，重建道德观念，仍是中国社会的一件艰难工程。

三、关于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理论

马克思说：“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其意是：共产党发动阶级斗争，以暴力夺取了政权，还需以暴力维护政权、巩固政权。列宁于1917年的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普列汉诺夫（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俄国革命早期马列主义理论权威、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在观察了列宁建立早期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之后，于1918年5月临去世前留下了“政治遗嘱”，并嘱：苏维埃解体后公布。这个重要文献于73年之后，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之后，被俄国《独立报》公布于世。普列汉诺夫对无产阶级专政作了深刻剖析，并预测了它的历史命运。普列汉诺夫指出：

“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演变成一党专政，再变为领袖专政。维持领袖权力起先是无产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旦实施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并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在欺骗和暴力基础上的社会。”这是普列汉诺夫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深刻解剖与天才预见，这已被苏共解散、苏联解体的历史巨变所验证。我们以此为对照，来看看当年“老兵”、“联动”那些高干子弟的所做所为，可以窥见到他们身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基因。他们鼓吹血统论，正是为着维护他们高人一等的权力，为着维护红色家族的特权。为着维护这一特权地位，他们曾发动了血腥的“八月恐怖”。而后又拼命保皇。当文革运动威胁到他们家族利益时，他们便把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当毛泽东掀起的冲击政敌的造反浪潮威胁到他们父母时，他们就不干了。但这不过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冲了自家人。到1967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便释放了联动全部成员。到了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1970至1972年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那就是中共通过“全面的国家恐怖”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了。

毛泽东把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提出“全面专政”的概念，其意是无产阶级专政要扩大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扩大到政治思想战线、文化、艺术、教育各界。1956年中国完成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上已消灭了中国并不强大的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称之为“民间企业”），资产阶级已不存在了。但毛泽东指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并没有结束，阶级斗争将延伸至政治思想战线、文化教育领域。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中共宣称这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由此而发生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把民主党派打了下去，把他们之中的少数头面人物从政府领导岗位上清除了出去，把知识分子整得禁若寒蝉，不敢再提意见。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一党专政的统治。1959年之后，毛泽东进一步把党内持批评意见的同志打成阶级敌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到文化大革命，把党内反对派打成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从而进一步树立了最高领袖的个人独裁，定于一尊，此即所谓全面专政。即毛个人对全党、全国的全面专治统治。

全面专政论的经典表述是《五一六通知》里面的一段文字：

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这段话告诉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专政的重点领域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专政的重点任务之一是批判这些领域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专

政要深入到“思想”；要清洗党、政、军和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开展夺权斗争。

专政的范围越来越大，专政的对象越来越多。思想也会犯罪。在“全面专政”下，人人自危，人人感到不安全。人人不知道那一天一觉醒来自己就变成了阶级敌人。实际在文化革命中，今天这批人整那批人，明天那批人整这批人。轮流整人，轮流挨整。过几天几批人一起挨整。整人，治人，其目的是树立全党、全国对一个人的敬畏、崇拜，对一个人的顶礼跪拜、绝对服从。这就是全面专政论在文革实践中的情景。

由于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实行专政，文化教育界自然首当其冲，北京大学自然在文革中在劫难逃，成了重灾区。

1966年8月，工作组从北大撤走后，批斗“黑帮”的烈火骤然烧旺，北大历史系的三院贴满了批判翦伯赞的大字报，也有揭发、批判系党总支及某些干部、教师的大字报。三院门口两侧有个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路过的人都能看到。后来同学间传说，李讷（毛泽东女儿、历史系65届毕业生）到北大调查后回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了此对联，毛说应改一个字，“浅”字改为“深”字，下联改成了“池深王八多”。李讷再到北大调查时，把这个最高指示告知了历史系老师和聂元梓，很快在全校传开。这一字之改，对北大文革的影响非同小可，造成了对各系干部、老教授们的猛烈冲击，笔者所在的历史系尤甚。当时北大掀起了抄家风。在劳改的“牛棚”里，有许多党员干部、教师被打成“黑帮”，白天在校园下地、拔草，脖子上挂个“×××黑帮”的牌子，晚上集中到“牛棚”睡觉。那时每天从全市和外省市来北大参观、取经的群众达几万人，高峰时每日达七、八万人。有些人围观“黑帮”劳改时，喊口号、辱骂、甚至推打。这些对全市、全国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那时在中国的最高学府、中华文化的象牙之塔，完全没有法制可言，暴民政治波及全国。那时有一篇毛著影响极大，即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北大人有人将其全文抄写成大字报贴在留学生宿舍楼对面的大字报苇席栏上。毛赞赏的“痞子文化”风行一时。

8月时，历史系有二十几个干部、教师被关入“牛棚”劳改。到9月时，历史系文革委员会在昌平太平庄（原历史系半工半读地址）设了劳改营，把关在燕园的向达、杨人楩、邓广铭、邵循正、商鸿逵、周一良、宿白、阎文儒、吴代封、郝斌、田余庆、徐华民等干部、教授23人送至此处劳动改造。一个月后开始分批返校，最后一批5人迟至67年3月返校。

下面再看看文革中、后期的北大。

1968年8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说大部分知识分子仍没有改造好资产阶级世界观，在上层建筑领域“要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长期留下去。”此后，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说法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在地、富、反、坏、右、资、叛徒、走资派之后，知识分子排第九位，是老九，包括大专院校师生，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边缘人物。

9月下旬，在工军宣队领导下，北大开始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在宣传队提出的“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的思想指导下，全校相继有900多人被重点审查。占当时全校师生总数的10%（注：据《北大百年纪事》）

12月12日，工宣队上报的《简报》称：“自清理阶级队伍以来，北大自杀了17人。”这是到1968年12月12日为止的自杀人数。（注：据《北大百年纪事》）北大

工军宣队的“清队”扩大化一直延续到1969年3月底。1969年3月底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进驻北大，扩大化的清队工作才告一段落。而后北大进入第二次清队。

北大清队中的自杀风潮之高峰，是12月18日翦伯赞夫妇自杀。

文革期间（1966年至1976年），北大非正常死亡63人，工军宣队期间死亡38人，占文革非正常死亡总数的60.3%。非正常死亡包括：自杀、折磨至死、武斗死亡。数字表明，文革期间，北大工军宣队对知识分子开展的阶级斗争，最残酷、最血腥。（注：据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开放杂志出版社2011年）

以上即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在北大文革时期的一鳞半爪之景象。

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文革中被中共中央吹捧为“马列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它突出地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在这个文件的结尾处亲自增加了一段重要文字如下：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段话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要“继续革命”的理论，认为与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是政权，最危险的敌人是在中央的党、政、军中已经篡了权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因此要夺权，要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命题，本身是个悖论，前提与主题相矛盾、相冲突。马列主义关于“革命”的经典含意是指：“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是指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全面夺取国家政权机构。那么，已经“无产阶级专政”了，还要去革这个政权的命，去推翻它。这不是荒谬绝伦吗？正是这一指导理论的谬误，造成文革中人心大乱，造成天下大乱，造成“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毛泽东被自己困在困局之中。一月风暴后，他曾批判“省无联”的口号“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是反动口号，因为很显然，如果“彻底改善”的话，他本人不是也要被“改善”掉了吗？于是我们看到：文革前二年1966、1967年闹革命，到一月风暴，发生“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向走资派的“夺权风暴”。接着后三年，1968、1969、1970年，又反过来对前两年的“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开展了“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领域”、“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肃清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一系列运动，都是镇压造反派群众，都是搞专政。前二年革命，后三年对前二年的革命专政，来回大折腾！

在“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文革中出现了“砸烂公、检、法”的口号，法制机构一度瘫痪，法制被严重破坏，出现了打、砸、抢风潮。1967年夏曾出现全国性的反军高潮，迫使毛泽东发出了“还我长城”的指示。1967年2月以后，全国各地翻身掌权的造反派，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生分裂，陷入打派仗，直至武斗。毛泽东的信徒们在同一个“继续革命”的旗帜下，竞争谁是真正的革命派，展开了激烈的内斗直至残酷的武斗。1967年

6月至1968年8月前，北大同样陷入了被这种思潮所裹挟、所左右的局面，两派皆然，概莫能外。

北大“井冈山”一派的小报《新北大报》于1967年8月30日发表了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该社论很显著地反映了当时“井冈山”骨干力量的主流思潮。该社论说：

一年来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雄辩地证明：北大旧王朝的国家机器并未摧毁。写过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根本不是马列主义者，在革命小将推翻了张承先临时政府以后，正是她抹杀和窃取了小将们的丰功伟绩，取张承先而代之，建立了一个名为红色政权、实则比临时政府更带有欺骗性的资产阶级政府。它网罗与集中了旧北大的一切保守势力，疯狂地扼杀小将的造反精神，完全成了压在成千上万革命群众头上的铁盖子，使北大未能按照主席所揭示的规律去完成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这正是北大运动的症结所在。也就是这个资产阶级政府，……时至今日，他们仍盘踞在北大的各个要害部门，还在固守资产阶级阵地，……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非彻底砸烂不可！这样的权非夺不可。

必须彻底砸烂校文革的资产阶级专政！必须彻底摧垮臭名昭著的新北大公社！

以上这篇社论很清楚地反映了当年“井冈山”骨干人物的思想，那就是阶级斗争，继续革命，不断夺权，“按照主席所揭示的规律去完成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陆平党委被打倒了，张承先工作组是临时政府也被推翻了，但社论说聂元梓、校文革仍是“资产阶级政府”，“非彻底砸烂不可！”其观点很符合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说“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必须将其“彻底摧毁”。社论还把矛头指向群众组织“新北大公社”，号召将其“彻底摧垮”。这里实在看不出什么“反聂是发扬了北大‘科学’与‘民主’的传统。”这类的反思实在可笑。聂元梓打倒陆平，反张承先工作组，到上海串联炮轰上海市委，“一月风暴”中参加高教部夺权，这些够左的了，“井冈山”还嫌其右，是“资产阶级政府”，提出“二次革命”、“全面夺权”的口号，这不是更左吗？这不是以极左反左吗？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井冈山”有些人早在1967年6月，当孙蓬一在整风会议作完检查之后，“团、零、飘”的一些人围着他又推又打；7月10日，“团、零、飘”部分人查封了保卫组，抢走了档案，后来又打伤了保卫组负责人谢甲林；12月底“井冈山”部分人绑架了校文革结合的干部崔雄崑；1968年1月16日，“井冈山”部分人攻打38楼“公社”学生居住室，抢走了三个喇叭；3月29日，“井冈山”武斗队攻占了40楼、32楼，赶走了居住在这两个楼的“公社”同学，刺伤了聂元梓。这一系列武斗事件，起码说明北大武斗是两派共同挑起，由小到大愈演愈烈的。“井冈山”个别人把自己说成是当年的弱者，受欺、反抗，而回避自己当年蛮横逼人、横行凶狠的思想、行为和形象，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校文革、“公社”一派在1967年至1968年8月，同样是被极左思潮占据着统治地位。他们同样是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井冈山”师生，以捍卫校文革是捍卫红色政权自居。校文革第一副主任孙蓬一强调与“井冈山”的斗争是“路线斗争”，而“路线斗争是不可调和的。”坚持要把“井冈山”打垮，吃掉，甚至亲自指挥武斗（如1968年4月26日指挥攻打被“井冈山”占领的36楼）。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校文革竟然于1968年5月，在两派武装割据、武斗气氛浓厚的形势下，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校文革成立“清队领导小组”，设立了三个“专案组”，清查“红旗飘”、“东方红”、“北京公社”三个小集团的“坏人”。在“专案组”的审讯中发生了逼、供、信的问题，李清崑文革后证实确有此等事，他曾奉聂元梓的指示去“专案组”劝说、制止搞逼、供、信。樊立勤同学被打伤、打残，就应发生于此时段。这是违反人权的迫害行为！这是校文革的一件极其严重的

罪错。校文革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方式，干了一件性质完全错误的事情。两派没有联合，武斗没有结束，在这个时间怎能开展“清队”？此时搞“清队”，只会是派性清队。审查时搞逼供信，打人，这完全是错误的、不人道的、也是违反政策的。校文革虽曾制止，但制止不力，发生了伤人至残事件。在群众组织里抓坏人，完全背离了当时中央的清队政策，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校文革的这个派性“清队”，是把对立面群众当阶级敌人打击。这是校文革的一件极其严重的罪错！武斗期间，北大死了三个无辜的生命，这更是校文革不能逃避的责任！

在1967年6月至1968年8月前，在北大最乱的年代，如果说“井冈山”的思潮偏重于受“继续革命”论的影响，要不断革命，不断“砸烂”一切体制的话；那么“校文革”、“公社”则偏重于受“全面专政”论的影响，为捍卫红色政权“校文革”，把全面专政对象指向了对立派的师生。

北大两派是路线斗争吗？当然不是！尽管校文革、聂、孙和“公社”的骨干力量当年确曾有过反左意识，反对过吴传启，抵制过王、关、戚，这是应肯定的。而“井冈山”有个别人也确曾受到吴传启、洪涛、王、关、戚的影响。但这都不足以形成两派师生你死我活的对立情绪。美国研究文革史华人学者、社会学博士乔晞华告诉笔者，他曾调查过全国25个省市的文革派性内斗，指出：1967年2月以后，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先后翻身、上台、掌权之后，无一例外全都分裂，出现新的两大派，打派仗，直至武斗。到了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7月，运动严重失控。四川两派甚至动枪、动炮、动军舰。但四川并没有王、关、戚插手之事。全国也有个别例外，如广西，那是因为造反派四二二始终受压，一直没翻上来成为主流。也就是说，四二二派还没来得及分裂就被镇压下去了。这说明当年的派斗、武斗有着共同的原因，有着普遍的规律在起作用。这共同的原因，即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文革实践中的必然结果。北大校友在对北大文革史的讨论中，郭罗基老师曾在群里对派斗提出个见解，指出打派仗是文革中的“通病”。我很赞同“通病”的提法。这是造反派群众的“通病”。是“病”！由于中央文革的来回挑拨，这病症就愈发严重。

文革中暴露出中国民间的派性性格如此普遍、严重，其深层原因，应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因子中挖掘。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行帮主义、帮派主义在中国民间有着深厚的传统。派性，热衷于“窝里斗”，这是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弱点，在文革中得到充分暴露。中国与古希腊的历史不同，不是海洋国家，人民缺乏向外拓展的眼光，而习惯于在黄土地上“坐井观天”，有着在一定范围的地盘上“窝里斗”的恶劣传统。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劣根性。这种“窝里斗”的恶习，至今在海外民运中仍屡见不鲜。

五、关于“五七”理想社会蓝图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是要大破大立，他要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这个新世界即是他的五七理想社会。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五·七指示也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办学的方针。

1966年8月1日，正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的当天，《五·七指示》的基本精神在《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当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中向全国公布。社论评价说：“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

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答案”。“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把各行各业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口号风行全国。走“五·七”道路成了时髦。到处办起五·七工厂、五·七农场、五·七大学、五·七中学、五·七干校、等等。按照《五·七指示》的设想，将会形成如下的社会：

第一，一个逐步消灭分工的社会。按《五七指示》来做，每个单位都有工、有农、有学、有兵，从而可以自成体系，自给自足。社会各行业之间的专业区别将消失。很显然，这是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落后思想来改造社会，同社会发展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趋势背道而驰。

第二，一个逐步消灭商品的社会。《五七指示》提出的“大学校”是对把人民公社办成一个“小社会”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设想由军队带头，在各条战线搞起来。但人民公社内部工、农、商、学、兵五业俱全，而“大学校”里只有工、农、学、兵，砍掉了商业。这是毛泽东的疏忽吗？不是。这是毛泽东经过60年代初期的几年探索和研究之后，下了决心，要逐步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制度。办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大学校”，是他设想出的消灭商品的途径。

第三，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毛泽东提出消灭社会分工和商品制度，目的是要消灭三大差别，企图以这种社会的基层单位结构，实现人人平等，向共产主义过渡。

毛泽东提出的五七理想社会蓝图，完全是一种脱离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空想社会主义。毛于文革前夕提出的“五七指示”，与他1958年关于人民公社的思路高度一致。

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到河北、河南与山东等地视察，与当地负责人谈到“小社”并入“大社”时，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后来毛总结“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

到了1958年9月29日止，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除西藏外，27个省市区共建立了人民公社23884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0·4%。

在人民公社，社员的鸡、鸭、牛、羊、猪、桌、椅、板、凳、农具、铁锅，一切充公。土地归公社所有。社员吃食堂，大锅饭。农民变成了现代农奴，没了生产积极性，却放开了肚子吃食堂，很快就吃光了存粮，许多食堂到了1959年就顿顿喝稀粥、咽野菜了。再后来，种子粮也吃光，粥也喝不上了。

由于人民公社脱离实际，是以空想代替现实，频频刮起“共产风”、“一平二调”，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很快降临了大灾大难。“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很快失败，1959年至1960年发生了大饥荒，饿死了3600多万人，有些地区发生了“人相食”的人间惨剧。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指出三年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得到党内绝大多数人的赞同。会后，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但他仍坚持自己空想社会主义的理念，到了1966年，又提出五七社会蓝图，实为已经失败的人民公社之翻版。

文革后期，随着五七指示遍地落实、开花，出现了一系列所谓的“新生事物”，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人领导大学、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赤脚医生、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五七干校，等等。所有这一切，随着毛泽东去世，很快便在改革开放年代烟消云散了。空想的东西，终归无法在现实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无法存在！

六、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

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去世前二年，多次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问题。于是中共中央从1974年底至1976年9月，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毛主席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理论的学习运动。笔者记得当时自己在县城中学就被领导指定加入了学校的理论学习组，各个机关、工厂、学校都有理论学习组。学校领导还请来了河北大学经济系教授到学校给教职工讲课，理论学习组还学习、讨论“梁效”的有关文章。但笔者一直也没搞明白那些理论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怎么就成了“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毛所引列宁语录）。

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中国“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12月26日，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同周恩来谈话：“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些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这里，毛把社会主义的一些制度，看作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需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间，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汇报时的多次谈话中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里，毛把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产生的根源，归根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

（以上1974、1975年毛泽东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引自：罗华：《毛泽东探索中国经济制度的思想脉络》2009年1月23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毛泽东所指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所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即是：工资差别、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商品生产等。这些最基本的社会与经济制度是与中国当代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与人们的思想状态相适应的，是不可能取消与限制的。按劳分配，物资刺激符合人的天性，否认这些经济原则只会打击人的生产积极性，使生产力衰退。而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更是市场经济的要素，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几乎为零，正需要松绑并大力发展。改革开放后实行市场经济，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已证明了毛理论之错谬。

毛泽东在垂死之年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目的有二：目的之一是，毛到了晚年，知道官僚中反对文革的人很多，担心死后文革被否定，因而要为自己发动文革寻找理论根据，提供合法性。他企图说明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上不存在资产阶级之后，由于资产阶级法权仍存在，仍会产生新生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走资派。目的之二，毛泽东念念不忘他的理想社会蓝图、他的乌托邦梦想。他的理想王国就是一个：没有商品经济、没有工资差别、没有货币、自给自足、实行供给制、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社会。而达到此理想王国的途

径即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通过强制性的手段，缩小体、脑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例如知青上山下乡、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即是这类改造社会的措施、手段。毛企图为他死后的中国，指明一条社会改革的方向、道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被红色高棉、波尔布特在柬埔寨进行了实验，得到全面落实。1975年4月17日柬共总书记波尔布特领导红色高棉武装力量占领了首都金边，推翻了朗诺政权。波尔布特随后建立了柬共一党专政的独裁政府，波尔布特出任总理。建国后两个月，波尔布特马上于1975年6月到北京访问，拜见毛泽东。波氏说：“我是毛主席的学生。”当时中国正值学习毛泽东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理论的高潮。波尔布特抵京恰逢其时，正好取到了建立理想社会的“真经”。

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柬共中央总书记波尔布特等人。毛泽东同波尔布特热烈握手，波尔布特激动地表示：我们今天能在这里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感到非常愉快！毛泽东谈道：你们的作战、战争、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统一战线，我不谈了。并指着邓小平说，我赞成他的，他说你们是正确的。在一个小时的会见中，毛泽东详细讲述了路线斗争问题，他说：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五十年犯了十次路线错误，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是局部的。你们基本上是正确的。至于有没有缺点，我不清楚。总会有，你们自己去纠正。毛还说：你们现在是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道路，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平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以后五十年，或者一百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一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到共产主义的时候，也有两条路线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毛泽东的指点，波尔布特深表认同，他说：“毛主席同我们谈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带战略性的问题。今后我们一定要遵照你的话去做。”波氏曾情不自禁地在北京的公开场合，高呼：毛主席万岁！（绿红兰青：《波尔布特四次访华经历》2012年10月16日《凯迪社区》）

波尔布特在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赞许与鼓励下，推行了一条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为左倾的路线。波氏通过血腥的专政在柬埔寨推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社会主义实践”。消灭富人，实行平均；消灭城市，迁出居民下乡务农；一夜之间驱赶金边200万人下乡；毁掉家具、电视、冰箱、汽车等等“奢侈”品；搞清队、肃反、阶级斗争，大屠杀中造成170万人死于非命；以革命性的名称更改街名；解体家庭，成立男、女劳动队强制劳动；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搞供给制；改造知识分子，如不能脱胎换骨，就从肉体上予以消灭；实行这场被柬共领导人称为“前无古人”的“高棉革命”，给柬埔寨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到了1977、1978年便发生了饥荒，饿死很多人。1978年爆发了反对红色高棉的人民起义，1979年1月7日越南人民军攻占金边，红色高棉大量人员投诚越南。柬共、波尔布特立马土崩瓦解。1月8日，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成立。波尔布特逃入西北、西南的山区、丛林。后来波尔布特因柬共内讧，被软禁。1998年4月16日，在软禁中因心脏病去世。

1979年越南人民军占领金边的日子：1月7日，如今成为柬埔寨的公众假日，名为“大屠杀逾越日”。金边南部当年红色高棉的集中营，现今是《波尔布特罪恶纪念馆》。

（以上波尔布特执政情况据方忱：《波尔布特和他的红色乌托邦》2016年5月26日《独立中文笔会·思想视野》）

张春桥曾当面赞扬波尔布特：“我们干过的，你们都干了。我们没敢干的，你们也干了。”毛泽东的理论被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做了充分的实践和展示。

七、关于文革目的“反修防修”说

毛泽东声称：发动文革的目的是为着“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发动文革说成是为着崇高的目的。在《五一六通知》中说，“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果真如此吗？非也！他是出于私心，而非公心，他的私心是什么？生前防篡权，死后防清算。他是为着个人的权和名。这是他个人最大利益所在。

毛泽东从1962年以后有个心病，这就是他1958、1959年所捅的大“娄子”，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失败，造成三年大饥荒，饿死3600多万人。刘少奇在中南海游泳池旁警告过他，“人相食，要上书的。”毛心里清楚，他罪责难洗。3600多万人饿死，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中外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人为大灾难，比中国历朝历代因饥荒而饿死人的总人数还多。这责任，能打马虎眼蒙混过去吗？前文提到的李南央女士与鲍彤先生的谈话录中，鲍说：“毛泽东为了搞倒刘少奇，不怕把共产党打得稀里哗啦，不怕把整个社会打得稀里哗啦，不怕把整个国家打得稀里哗啦。毛泽东不能容忍刘少奇在他身后做秘密报告。刘少奇要做的秘密报告是什么呢？饿死人。”鲍彤对毛发动文革的私心所在，对个人利益的算计，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在发生了大饥荒之后，毛泽东企图创立一个空前的英雄伟绩——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夺回人心，来掩盖饿死三千多万人的罪行，来把刘少奇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使其不可能在自己身后作秘密报告。毛为掩盖一个罪错，犯下一个更大的罪错。

这样讲，有什么根据？有以下三条依据。

第一条依据，1967年2月毛泽东与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的巴卢库的一段谈话。毛泽东对巴卢库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这个修正主义是指谁？在毛讲此话的1967年2月，全国、全世界已明白，是指刘少奇。毛为什么从七千人大会起与刘算账？1962年1月27日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作口头报告，其中讲到那句名垂青史的“真言”：“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时会场什么反应？“起先，大家一下仿佛怔住了，接着，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这场景，肯定深深印在了坐在主席台中央的毛泽东的脑海里。（以上内容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

1967年4月12日江青的一句话，让我们进一步明瞭为什么毛泽东与刘算账，要从七千人大会算起。江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毛憋了一口什么气？显然是人祸问题。毛担心，如继续追责，他就得下台；如死后有人作秘密报告，那就是刘少奇。毛的志向是做万古流芳的伟人，做国际共运的领袖，他岂能容忍刘少奇这样的“隐患”，于是刘少奇被认定为修正主义，他要打倒刘少奇，生前防篡权，死后防清算。

第二条依据，即是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的最后一句话：“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这张大字报发表于文革的关键时刻1966年8月5日，自此打垮刘少奇的风暴从天而降，全国兴起了炮轰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造反大潮，当时造反派群众主要是发泄对50多天里刘邓工作组压迫群众的不满，而很少有人认真思索“1962年的右倾”是怎么回事。而这恰恰是毛泽东的心结所在。毛所指刘的“1962年的右倾”，即是具体所指刘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同时也是具体所指刘当面对他讲的：“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一言以蔽之，问责大饥荒即“1962年右倾”的要害，这便是大饥荒与文革的因果关系。

大饥荒这件事，应是毛泽东一生的禁忌。饿死这么多的国人，这么一件天大之事，中共中央却在三十多年间严密封锁信息，直到八十年代末才逐渐开始被人首先在香港媒体披露。笔者1960年曾因粮食定量，吃不饱饭，得了浮肿病，但对北京之外的广大农村田园荒芜、盲流乱串、饿殍遍野、易子而食的人间惨景竟一无所知。直到八十年代末在香港看到了丁抒先生所著《人祸》一书，才知晓大饥荒竟然饿死了国人三千多万。当年刘对毛说“饿死这么多人”，“人相食”。说明他们当年明明是知道实情的。毛至死在毛著、中央文件、会议讲话中，对大饥荒保持缄默，只字不提，始终回避。其内心之恐惧，防范之严密，可见一斑。1962年当刘对毛说“人相食，要上书的”那句话时，毛斥责刘：“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你怎么办？”（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0页）毛在脑子里转悠着他死后的场景，他会想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鞭笞斯大林场面。

第三条依据，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人们后来在文革中知晓，此文是江青奉毛泽东旨意到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撰写、发表。该文生拉硬扯，硬把《海瑞罢官》一剧与1959年的庐山会议相联系，显示了文革与庐山会议的内在联系，与大饥荒的内在联系。

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错误地发动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把本来纠左的会议转向，变为反右倾，本应叫停的大跃进，变成继续跃进，于是大饥荒越演越烈，饿死了更多的人。到了1960年底，大饥荒继续恶化，毛才被迫停止大跃进，同意调整政策。到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毛不得已退却，勉为其难地做了检讨。在会后的常委会上毛提出辞去党中央主席之职，但被周恩来挽留。会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在第一线主持调整、纠偏，毛退居二线。这是毛一生中的重大政治挫败。

七千人大会后，彭德怀给党中央写了八万言的申诉书，要求平反。1965年9月23日，毛在彭德怀去三线任副总指挥时接见彭，对彭说，“也许真理在你一边……对你的事，看起来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据沈国凡：《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毛说此话时，刘、邓、彭真在座。对大跃进引发的大饥荒，其是非曲直，毛心里是清楚的。但彭在庐山上逆了龙鳞，冒犯了毛的权威。因此毛虽然在庐山上最初也想反左、纠偏，但自己改错可以，别人批评就不行。彭德怀写了意见信，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得不偿失”，这下不得了，整个会议转而批彭，反右。皇上就是这么任性，其最高权威绝不能有丁点冒犯。毛说什么“等几年再说吧。”这完全是瞎扯淡。毛要发动文革，把彭从北京支走别碍事是真，什么过几年，才过了一年零三个月，在文革高潮的1966年12月彭德怀就被奉中央之命的地院“东方红”揪回北京批斗。《王大宾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出版）第45页写道：1966年“12月17日上午……朱成昭说党中央、中央文革指示，要地院东方红把现在成都的彭德怀揪回北京。”第68页写道：“周总理又给了朱成昭有关揪彭的三点指示……，1、北地东方红要

和成都军区一起，安全地把彭德怀护送回去（指北京）……”很显然，没有毛的旨意，中央文革、周恩来是不可能下令地院东方红把彭揪回北京批斗。毛终究不想放过彭德怀，根源还在于要埋葬掉大饥荒这件事。为着根除大饥荒的心病，他断然决定，下一盘大棋，来一场豪赌，用史无前例的英雄伟绩——文化大革命，来占领道德制高点，打倒政敌，挽救自己的历史声誉。

1965年10月，在毛送彭德怀去三线并道歉后仅一个月，毛便通过江青安排姚文元批判吴晗的历史新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革的序幕。毛很快挑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谈话》）毛自比“皇帝”，而彭德怀、刘少奇，这就是被毛定性的修正主义分子，是死敌。他所谓的反修防修，就是反刘、彭，防刘、彭一类政敌。

回想文革期间，工军宣队多次组织笔者和同学们参加“忆苦思甜”活动，还吃糠混和野菜的记忆苦饭，被教育绝不能让资本主义复辟，否则会使劳动人民吃二茬苦，受二茬罪。并被教育世界上帝、修、反的国家里劳动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经过常年的洗脑，笔者与同学们天真地以为：文革是伟大的正义事业，一定要把世界革命进行到底，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那知是上当受骗！

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好心办了坏事？还是出于私心，出于一己私利？毛泽东和一般人一样，是肉身凡胎，是渺小的脊椎动物，有七情六欲、个人利益。他发动文革，有利益驱动，私心考量。由于他的经历、学识、地位与常人不同，他的私心自然也有别于常人。毛念兹在兹的是要做千古一帝、共运导师，万古流芳。他在意的是自己的历史地位、历史评价。因此他要发动文革，抹掉大饥荒的污迹，生前防篡权，死后防鞭尸。但他提出的口号却是充满正义性的革命言词：反修防修。

八、结束语

美国华人史学家唐德刚是研究宏观历史的著名专家，他把中国近现代史比喻为通过长江三峡。说它是从古老的帝国专制社会向现代的民主法制社会转型的中间环节，是历史发展的瓶颈，好比长江之三峡。

唐教授的“历史三峡论”，概言之便是，中国历史在秦朝出现了第一次“大转型”，由封建制转到郡县制，由公元前4世纪中叶商鞅变法开始，一直到汉武帝与昭帝之间（约公元前86年）才大致安定下来，前后转型了二三百之久，自此这一秦汉模式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便一成不变地延续下来，形成了中央集权大帝国的封建专制模式，亦即毛泽东所谓的“百代都行秦政法”。及至清末，中国出现了第二次大转型，由帝治转向民治，用唐先生的话说便是：这第二次大转型是由鸦片战争开始而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唐先生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过不尽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的一日，从此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这是历史的必然。在后毛泽东时代，即使在通过三峡时，仍会有险滩、暗礁、漩涡、回流，但中华民族的航船终会冲出三峡！

唐德刚指出，毛泽东专制统治正是这个转型的末期，代表着中华民族二千多年中央集权封建帝国专制统治的最后阶段，是专制帝国的回光返照。文革是由专制独裁向民主、法制转型过程中，帝制所进行的最后挣扎和激烈对抗。

笔者赞同唐先生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宏观分析，认为十分精辟！

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毛泽东个人权威的高度树立，个人权力的高度集中。独裁者的权力达到中国专制历史从未有过的顶峰。当年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是法律，每一句“最高指示”一下达，全国百姓都要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欢呼庆祝。然后全党全国贯彻执行。如林彪所说，“一阵风吹下来，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毛泽东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是“斯大林加秦始皇”。毛泽东是秦始皇的继承人，是中央集权封建帝国的继承者，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残暴的专制帝王。“绝对权力绝对腐蚀人”。毛泽东晚年沉浸在无上权威的氛围中，掌控着生杀予夺大权，整个国家被他折腾的千疮百孔，百业俱废，人民生活不升反降，国民经济跌到了崩溃边缘。据叶剑英1982年9月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披露：文革中有250万干部被斗；非正常死亡68万多人；有120万地、富及其家属被迫害而非正常死亡；有1亿1千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政治打击。

毛泽东作为大独裁者，确实确实是位孤家寡人，是宝塔尖上孤零零的一个人，人一走，天就变了。物极必反，毛之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2018年8月11日 于美国德州奥斯汀寓中

~~~~~

## 【史海钩沉】

### “二丁事件”和庄则栋政治浮沉

· 钱 江 ·

〔编者按：“二丁事件”是十年浩劫后期发生的三大“小人物事件”之一。另两个分别为“张铁生白卷”事件和“小学生日记”事件。三个事件密集发生在1973年8月至1974年2月半年之间，均产生很大的社会负面影响。比较而言，“二丁事件”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体育界而不及另两者。著名乒乓球选手庄则栋的政治跌宕即由此而产生，发人深省。幸运的倒是“二丁事件”中的两个小人物“二丁”，庄则栋的政治沉浮对他们没有多大影响，这也是事后人们对此知之不多的重要原因。如今事件渐行渐远，本文作者采访了主要当事人，或许可以还原这段故事的真相。〕

#### ◇ 庄则栋撞上“二丁事件”

1974年2月中旬，庄则栋结束在“中央读书班”的学习回到国家体委，才过了十来天就碰上了“二丁事件”。

回顾刚刚过去的1973年，是庄则栋政治生涯的“次高点”。他在这年担任了国家体委党的核心小组（以下简称党组）副书记，是相当于副部长的高级职务。此前的60年代，他领略乒坛赛场无限风光，以独特的中近台两面快攻打法横睨群雄，将全国三连冠、世界锦标赛三连冠均收入囊中。从1961年到1971年，以庄则栋为主力的中国乒乓球男队四

夺世锦赛男团冠军。1973年秋天，国际乒联永久性授予他一座复制的男单奖杯“圣·勃莱德”。有这个奖杯，他称得上毫无遗憾地向运动员生涯告别了。

在国际乒联主席伊万斯到北京授予庄则栋复制的“圣·勃莱德”杯之前几天，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庄则栋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运动员中当选的第一个中央委员，党内地位超过了在职的体委主任。中国体育系统中，庄则栋亦是唯一的中央委员，一颗政治新星就要冉冉升起。

担任党组领导职务不久，他参加了于1973年10月6日至1974年2月11日，在北京举办的第二期“中央读书班”，编入“地方班”。支部书记由来自天津的孙健担任，班里还有两位来自上海、当时很有些知名度的“造反”人物祝家耀和金祖敏。见到这两个人，庄则栋有些惶恐，因为学习班里像他们这样的几位“学员”靠“造反”起家，对“文革”颇有贡献。而庄则栋本人，“文革”开始的时候还是出名的“保皇派”。偏偏是，来自上海的造反派头头年龄和庄则栋接近，彼此间说话多一些，还喜欢和庄则栋在课后挥拍打几下乒乓球。

这期学习班开班第一课，就是学习毛泽东决心发起“文革”时从韶山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一封信。领袖对夫人的信任，给33岁的庄则栋留下深刻印象。

1974年1月初，读书班即将结业时，突然发生三件大事；一是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为此要求学员安排几天时间学习、讨论毛泽东在对调会上的讲话；二是王洪文提出要增加“文化大革命再教育”的课程，学员也增加了讨论；三是江青突然召集万人大会，进行“批林批孔运动”动员，“中央读书班”学员们也要专题讨论。2月8日，王洪文到读书班接见学员作结业告别，要求学员回去后直接写信向他反映本单位“批林批孔”的情况。

庄则栋参加这期学习班，以及学习班结束时“批林批孔运动”的掀起，为他种下了悲剧的种子，波诡云谲的政治生涯向庄则栋招手了。

“文革”开始后的1968年5月12日，国家体委系统由解放军总参军训部实行军管，军管会主任是军训部长曹诚。1971年7月，国家体委结束军管，曹诚回部队任职，原任第38军政委、此时已担任北京军区副政委的王猛调任国家体委主任。

王猛是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从部队调来的，原国家体委军管会属于总参谋长黄永胜指挥序列，王猛就任后，体委重归国务院领导。

从1971年7月29日起到年底，江青先后6次参与体育界活动或讲话。从8月31日起，江青把张春桥、姚文元也拉了进来，或一同讲话，或一起观看表演。此中深意，如江青的多次表白：他们到体委看“表演”，是看“政治球”，或曰看“体育政治”的。从1971年夏天到1973年底，江青对体委主任王猛极力拉拢，不是要王猛陪同参观或看“表演”，就是要王猛陪她看电影，乃至席间要和王猛掰手腕角力等，弄得王猛直生闷气。

王猛到体委后迅速熟悉工作，大批解放被打压“靠边站”的干部，让他们重新投入工作，实际上否定了“文革”肇始大批干部和著名选手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做法，引起了江青的不满。王猛初到体委时对江青很尊重，这其中自然包含对领袖的忠诚。但到后来，王猛越来越觉得江青的行为不得体，而且对江青总是和周恩来闹别扭很有意见，他开始有意无意地躲避江青。

庄则栋从第二期“中央读书班”学习归来不过十来天的时候，发生了内蒙古乒乓球队的“二丁事件”。

“二丁”是一对于姓兄妹，哥哥丁立春、妹妹丁桂荣都是内蒙古乒乓球队选手，分别出生于1946年和1948年，当时年龄27岁和25岁，就要退役了，丁立春希望留队当教练，但球队主教练李岩毅认为教练员位置上已经有人，此事需仔细商量。丁立春留队心切，抓住了球队的一次差错，和妹妹联名写信给国家体委领导。

原来，在年前的全国少年比赛报名时，内蒙古队希望争得好名次，报上了两个稍有超龄的队员，结果被比赛组委会发现予以制止，内蒙古队马上按照要求改了过来。按说此事已经解决，但丁立春认为事情解决得不彻底，教练员对自己有意见，为此还和队员有肢体冲突厮打。发现自己最初上告没有反应，丁立春和妹妹再次联名写信称内蒙古体委领导搞“锦标主义”，对自己“打击报复”，这就是“二丁事件”。

#### ◇ 王猛对“二丁事件”的处理

此事本来是球队成员之间的小纠纷，但在“文革”中，两位年轻人把事情上纲上线了，他们写信给刚复刊的《体育报》。1974年2月，报社有人将此事写成内参，呈报“中央文革”领导。（2017年9月26日在呼和浩特访问原内蒙古乒乓球队教练李岩毅的记录。）

江青正在发起“批林批孔运动”，想找机会整一整王猛苦于没有把柄，看到内参和信件如获至宝，即于1974年2月21日写了一段批示：“应该责成王猛同志妥善处理。赔礼道歉，医治欧（殴）伤。揭开体育系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

江青的批示前半段还算就事论事，后半段就很离谱了。她还就此事串通了当时担任党中央副主席的“造反派”大头子王洪文于次日批示：“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请转王猛同志即办。”

这两个批示于2月23日送到了王猛手里。看到两位中央领导人的批示，王猛很重视，随即召开党组会议传达。王猛当时还不知道“二丁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责成体委办公厅副主任郭连刚组成调查小组，立即赶往呼和浩特，先将情况了解清楚，然后再行处理。

郭连刚是一位“三八式”老革命，山西沁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1940年入党，1942年进入延安抗大学习。学习结业后到晋冀鲁豫根据地，后来随二野大军进入西南，再后来由重庆调入国家体委，1966年“文革”爆发前担任办公厅副主任，负责行政和经费事务，结果成了办公厅中唯一没有被“打倒”始终在工作状态的领导。

他被指定为前往内蒙古调查“二丁事件”小组的负责人，小组还有4人是：《体育报》副总编辑王舜华、编辑曹炎（女）、李明光，还有体委宣传司负责记者联系事务的李秉达。

行前，王猛将郭连刚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要他阅读此事的内参报告和江青、王洪文的批示，然后交给郭连刚一封手书信件，要他先读一遍，到呼和浩特面交内蒙古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尤太忠。

郭连刚的记忆很清晰，还记得信的大意是：老尤同志，内蒙古体委对问题虽然已经处理，但有人反映他们对二丁进行打击报复。请老尤同志支持我们的调查组工作。

王猛在信中称尤太忠为“老尤”，可见他们彼此熟悉。郭连刚领命之后就乘火车前往呼和浩特。（2017年12月15日对郭连刚的访问记录。）

了解事情经过需要一个过程。当时从北京到呼市乘火车要将近一整天，再快的调查，加上路途往返，起码五六天时间，何况是江青、王洪文批下的东西，调查组哪里敢马虎。没想到王洪文等不及了，派秘书廖祖康于2月26日来到体委，先是找到体委造反派组织的头头询问，王洪文、江青的批示已经4天过去了，“王猛扣住中央首长的批示不向群众传达，不贯彻落实，这是什么问题？这里一定有鬼”。

体委的造反派自王猛上任以后，眼看着老干部一个个恢复工作，运动员恢复训练，“文革”的地盘一步步被侵削，正心里着急，得到王洪文大秘书发出的信息，自以为得风气之先，立即鼓动起来，纷纷贴出大字报责问王猛，说他扣押中央领导批示是何居心？为什么不向群众传达？鬼在哪里？

◇ 庄则栋承担责任说清楚，突然变卦

面对乱局，王猛于3月5日召开党组会议商量。他向与会者说明，中央首长的批示是批给我的，当然由我马上来处理，首先是调查事件的来龙去脉，现在郭连刚率领调查组已经去了呼市。事情真相没有弄清楚之前，没有必要开大会传达，所以也根本不存在什么“扣押”。但是现在有些人不相信，认为这里有鬼，闹了起来，怎么办？

党组成员在讨论中认为，既然群众已经闹了起来，又有上面来人催问，那就开大会向大家讲清楚，这样比较稳妥。

王猛接受大家的意见，说好，那就在明天开会，我来把事情经过说一下。但是，他只能把派出调查组去内蒙古的事情说一下，因为调查组多方取证调查，已经缠在呼市了。

原来，调查组一到呼市火车站，就见到站台上有人打着一个招牌迎接，那牌子上写着：接江青同志派来的调查组。

郭连刚下车以后就对举牌子的人说，对不起啊，我们不是江青同志派来的，我们是国家体委王猛同志派来的，调查内蒙体委的情况。

随后，郭连刚面见主持内蒙古工作的尤太忠，送交了王猛的信。

尤太忠看了王猛的亲笔信以后，没有任何包庇内蒙古体委的意思。他说，我知道了，反映问题是好的，有问题，处理也是应该的，而且要严肃处理。我支持你们去认真调查。

看到内蒙古一把手这样重视，调查组的行动更加谨慎，连续不断地找当事人谈话，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也就不能向王猛详细汇报，只告诉他已经面交了给尤太忠的信。

因此，王猛要召开国家体委干部大会传达有关“二丁事件”的情况，也只能是概略的，点到调查部署而已，内容有限。

党组会议开到这时，在座的党组副组长庄则栋主动说，为两个乒乓球选手的事情，主任要出面说一下当然好，我觉得还不如由我来出面向大家讲一讲更好。因为我不是当事人，却是乒乓球队里出来的，我来讲这件事大家更容易接受。

王猛一听很受感动，欣然接受。党组成员也一致认为由新任中央委员庄则栋出面讲话效果更好。当时在一边作会议记录的党组秘书王鼎华听了也在心里叫好，觉得：“小庄真棒，危难时刻敢于挺身而出，敢于承担，果然是大大进步了。”原来，王鼎华自1960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就到北京《体育报》当记者，经常采访中国乒乓球队，对庄则栋的成长过程很熟悉，和庄则栋也很谈得来。

当时的庄则栋确实支持王猛工作，会议结束时表示自己要赶紧回办公室准备一下明天上午的讲话内容。

第二天早晨，王鼎华拿着笔记本早早来到国家体委体育科研所4楼报告厅，到早晨8：30，报告厅里已经坐满。王猛主持开会，告诉大家，注意到各单位对中央领导批示的反应，所以开这个会。本来嘛，应该等到调查小组从呼市回来，把情况弄明白了再开会更合适，现在因为大家迫切想知道，体委是怎么落实领导批示的，所以今天就开会把情况告诉大家。

王猛宣布，现在就请庄则栋同志代表党组，传达落实中央领导批示的情况。于是，庄则栋上台发言了。

谁也没有想到，庄则栋语出惊人，他说：“王猛，这4天的情况，是你的事，应该由你来讲。江青同志、洪文同志的批示是给你的，你必须向群众做出交代，用不着我来讲。”当时王鼎华就坐在第一排，正和庄则栋面对面，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身为党组秘书，昨天庄则栋的发言，他记得清清楚楚，怎么一夜就变了？而且，平日里庄则栋对王猛非常尊重，一口一个“主任”，姓氏都不称，如今大庭广众之间直呼其名，气势汹汹，一副对立的样子。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把他弄糊涂了。（2017年10月在北京对王鼎华的访问记录）

◇ 原来江青和庄则栋直接连线了

两年半之后，“四人帮”倒台，一损俱损，庄则栋即被隔离审查，这才真相大白。

据国家体委原政策法规司司长王鼎华先生描述：原来，3月5日白天的事务散去，庄则栋回到自己的小宿舍——运动员大楼411室，正要准备明天的“说明白”讲话，突然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两位体委“造反派”头头，一人姓李，一人姓张。正是他们直接从王洪文秘书廖祖康处获得了江青、王洪文的批示内容，是廖祖康煽风点火的对象。眼下他们听说明天小庄要出面“说清楚”，于是上门向庄则栋点拨不要上当，斗争形势很复杂，不要出来替王猛讲话，既然是江青同志作的批示，应该直接请示江青同志。

庄则栋一听，觉得有道理，因为他没有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明白。好在现在已经可以用国家体委的“红机子”直通枢密了，他立即拨通了江青办公室的电话，得到答复说请马上到钓鱼台来。此时已是3月6日凌晨，庄则栋跳上小轿车驶进了钓鱼台，只见王洪文也在江青处等待。江青对庄则栋说：小庄，你刚才给我打电话，我正准备吃安眠药睡觉。听说你有急事，我推迟了睡觉时间。今后你什么时候来找我，我就什么时候见你。庄则栋一听，马上把体委党组会议上的事情一说。江青明确答复：你别上他的当，王猛是想把你推向第一线，

是很狡猾的。江青指示庄则栋下一步的行动：今天上午的会你去参加，你跟他（王猛）说：“这是一位副主席、一位政治局委员批给你的，对这4天的问题，你向群众交代，我不管。”把皮球给踢回去。江青还对庄则栋说，王猛在十次路线斗争中是有问题的。他和林彪的关系不清，屁股不干净，有些言行他没有交代。这个人太可恶了，你要发动群众大揭大批。王洪文也说，现在你赶紧回去，我们支持你，以后有什么事就来找我们。

于是庄则栋匆匆赶回体委。人之生涯，高尚和猥琐、黎明和黑暗之间，有时只有一线之隔，这在庄则栋的政治生涯中即有真切反映。当庄则栋在3月6日凌晨离开钓鱼台的时候，他和几个小时之前的庄则栋，已经判若两人。

接着就发生了在3月6日体委大会上他对王猛主任的当面斥责。

◇ 王猛临危不惧，小庄再次低头

面对庄则栋突然反水，会场上惊倒一片。54岁的王猛面对突然袭击，表现出久经战阵的将军气度，沉稳地站出来将事情原委说了一遍，强调说明，就此事已经派出调查组，现在他们正在呼市调查，还没有报告结果。一番话说完，台下没有了声音。

显然是为了打破僵局，庄则栋又突然发话：“王猛，你跟林彪是什么关系？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出来？”这几句，都是江青教的。王猛不动声色地回答，我和林彪没有什么关系，过去并不认识。到了这时，庄则栋没词儿了，会议也就结束了。王猛非常生气，但他知道这个变故后面必有文章，否则庄则栋不会这样做。庄则栋则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好。他心里明白，在大会上突然反水袭击，肯定已经和王猛完全对立，没有回旋余地了。

江青和王洪文预知这个结果，于十多小时后的3月7日凌晨召见庄则栋。这回，江青不再文约缜说话了，当着庄则栋的面大骂：“王猛是林彪线上的人，王猛你猛不了了，天马行空，独往不能独来。”“毒蛇是先咬人的，你咬了我一口，我一定要咬你。”庄则栋请示：“王猛态度很硬。我们攻他什么呢？”

其实江青并不掌握什么材料，她只是鼓励乒乓球冠军：“你不要怕嘛，我给你提供炮弹。”她指示庄则栋，“让别人出面，问他给林彪送了什么礼？”江青说：王猛去（体委）不得力，他后面的人也不好。庄则栋说，王猛来体委是周总理亲自点的名，从38军调来的。江青马上说：“王猛一点也不懂体育，这样的干部也能调到体委去？”

这时庄则栋突然想起，近日周恩来总理对王猛将出访西德有个批示，而且就在他的文件包里，他马上拿出来给江青看了。原来，这是3月5日国家体委和外交部会签的《关于王猛同志应邀回访西德的请示报告》，周恩来同意王猛出国，批示：“请王猛同志在国家体委的批林批孔运动中，采取积极提倡和欢迎群众批判自己的认真、严格、热情的态度，才可把体委的运动发动起来。”周恩来并不知道“二丁事件”，他的批语是要和江青推动的“批林批孔”相呼应一下。

江青不肯让王猛此时出国，立即让王洪文要通周恩来的电话，明确要求周恩来改写批示。江青叮嘱王洪文：“你问问他准备怎么写？写好了我们还要看一看。”王洪文放下电话不一会儿，江青处的电话又响了，秘书报告是周恩来总理打电话到这里找庄则栋，显然是已经打电话到体委找过了。

庄则栋要接电话，被江青制止。她对王洪文说：“告诉他，庄则栋没有来过我们这里，打电话到体委去找。”她扭头又对庄则栋说：“快回去，别说你到过我们这里。你接到总理的电话，把他对你说的话记下来，一个字也不要漏，然后打电话告诉我们。”

结果，庄则栋马上回到体委去，和周恩来通了电话，说眼下王猛不宜出国访问。庄则栋是得到江青、王洪文授意的，否则哪里敢打这个电话。周恩来一听就明白了。在这个背景下，已经抱病在身的周恩来退让了，当即亲笔给王猛、庄则栋写了一封信：

王猛、庄则栋同志：

听说体委动员批林批孔的大会正在开，如果王猛同志今晨将我在一个要出国的文件上，写给你们几句希望的话念给大家听，大家会问，下文如何？我就请你们代答，如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大揭大批、批深批透，批得王猛同志来不及出国，那也不要紧，可换别人去。我方才把这几句话的内容从电话中告诉了庄则栋同志，现在以书面补告。

即致

敬礼！

周恩来

1974年3月6日4时

实际上，这个短信是3月7日写的，取代前一个批示。即便是让步，周恩来的信也写得婉转周全，不露破绽。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庄则栋铸下大错。他不仅被江青、王洪文指挥得团团转，对王猛背信弃义地横加指责，而且对周恩来总理撒了谎。正因为他对周恩来撒了谎，隐瞒了他在江青和王洪文处的活动，后来他在家中无意间说起此事，引起妻子鲍蕙荞极大不满，两人之间产生隔阂。后来，这个隔阂演化为感情的冰河，两人最终劳燕分飞。

郭连刚小组的调查，在尤太忠直接帮助下进行。尤太忠本人也来到调查座谈现场，听取乒乓球队领队、教练，涉事选手的陈述。他们弄清了事情原委，认为是队内成员间的小纠纷，与“阶级斗争”无关。但为了应付“批示”，调查组责令当事教练检讨，然后调离教练岗位。即便是“调离”，也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加以保护的结果。时任区党委副书记的王铎在“调查”进入尾声时亲自打电话给李岩毅说：“对调查你不要再说些什么，先离开球队躲一躲。”

两位丁姓兄妹，因为到龄就退役了。实际上，正是这样的措施保护了“二丁”和主教练。两年后“文革”结束，李岩毅重回教练岗位，“二丁”兄妹逐渐以教授乒乓球为业，过着可称宽裕的生活，和教练重归于好。

郭连刚在呼市调查和处理“二丁事件”，整整花了3个多月时间，待他们回到北京，王猛已经“靠边站”了，不久调离体委回军队工作。

国家体委主任则由庄则栋取代，这正是庄则栋悲剧之所在。他政治生命的跌宕悲剧，就是在1974年3月5日至7日的两天里拉开序幕的。这位乒乓球世界冠军的自负和冲动、对极左思想的追随和推行，使他在悲剧道路上渐行渐远。

（2018年3月于北京）

注：本文作者采访了前任国家体委政策法规司司长王鼎华先生，采用了他提供的历史资料；还采访了郭连刚、李岩毅先生，采用了他们回忆口述资料，在此衷心感谢！

□ 原载《世纪》杂志 2018 年第 4 期，责任编辑：崖丽娟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华夏文摘》网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 <a href="mailto:tougao@cnd.org">tougao@cnd.org</a> 其它事项请电邮：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